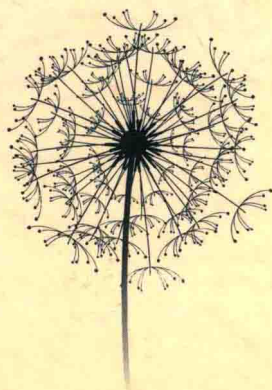


张志彪
著

现代性的
文学想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张志彪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文学想象/张志彪著.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683-0019-3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6223 号

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张志彪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 712100
电 话	总编室: 029-87093105	发行部: 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开 本	789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24 千字	

ISBN 978-7-5683-0019-3

定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写在前面

现代性概念为舶来品,不止一代国人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想象。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与其对等的基因,仍是一个尚需认真研究的课题。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对中国未来社会的现代性想象,与这一舶来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还应看到,根植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观念,和这一舶来品有着本质的区别。严格地说,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性观念,仍属中西观念的“嫁接体”,部分取自中国传统,部分源于西方。面对这历史场景,中国现代作家或反思传统,或从传统中汲取养料,或直接向外索求,表现出多面向的现代性书写策略。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铁屋中的呐喊	1
◎孤独的觉醒者	3
◎不在场的觉醒者	31
第二章 沈从文:悠远的烛虚	59
◎历史传奇	66
◎现实传奇	89
第三章 郁达夫:域外之镜	135
◎日本女性	137
◎“他者”与“自我”	171
后 记	193

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第一章 鲁迅：铁屋中的呐喊





◎ 孤独的觉醒者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此前，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发生过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意义的会面，会面的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钱玄同，即引文中的金心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样记载：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



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①。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偶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说它偶然,是因为在会面前,双方没有任何沟通,对钱玄同来说,这当然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但对鲁迅,却是一次不期而遇,至于会面的结果,对鲁迅甚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两人恐怕都未曾料及;说它必然,表面看,似乎冥冥中有种“力”,此前,这“力”伏于暗处,等待合适的时间、地点,一旦两者皆备,该发生的便成为必然。其实,只要仔细想想,事件似乎有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当时,白话文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口号和理论不管叫得多响,但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作品却迟迟不能面世。对钱玄同这些热血青年,这自然是这场运动或革命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最大障碍,而且也是靠他们自身无力解决的障碍,他们需要一个更有实力且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的重量级人物出场,此时,鲁迅已蛰伏多年,自然成了他们的不二人选。而当时的鲁迅,自日本归国后,一直奔波无定,当然,对于他,生活无定的影响远远小于人生目标的无定。他有思想、有实力、有敏锐的眼光,却只能身困寓所,靠钞古碑打发时日、砥砺身心,此时,他也需要一个能将自己心胸抱负展示于世的平台,他要在这个平台上演绎一出出和腐朽怪犷的传统文化短兵相接的正剧,白话小说正是这个平台,钱玄同仅仅是个引子。然而,不管怎样,《狂人日记》诞生了,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之一,从此真正肩负起了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从此开始了一个与此前迥然不同的纪元。当然,小说的现代化进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某一文学现象即能界定其肇始的准确时间,但《狂人日记》出现的

^①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划时代意义勿庸置疑，“是鲁迅在时代转折关头，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宣言^①”。“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如果此说成立）转向主动的关键时间节点，正是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小说主动参与其中并挑起了第一面反抗的大纛。

正如鲁迅所言，《狂人日记》后一发不可收拾，《孔乙己》（1919年3月）、《药》（1919年4月）、《明天》（1920年6月）、《一件小事》（1920年7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10月）、《风波》（1920年10月）、《故乡》（1921年1月）、《阿Q正传》（1921年12月）、《端午节》（1922年6月）、《白光》（1922年6月）、《兔和猫》（1922年10月）、《鸭的喜剧》（1922年10月）、《社戏》（1922年10月）等连续推出，1923年8月结集，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发行，共收15篇小说，含后改为《补天》的《不周山》，作者生前《呐喊》印行二十二版次。1926年8月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彷徨》，作者生前印行十五版次。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解释取“呐喊”为小说集名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便称之为《呐喊》^②。”自此，“呐喊”这个词便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1

有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的总纲，这一判断是合理的，《狂人日记》中所隐含的所有母题和艺术表现手法在他后来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②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鲁迅自己说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①,周作人也认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目标是古来的封建道德,以后的攻击便都集中在那上面^②。”那么,出于“新人”、“改造民族灵魂”的鲁迅为何将第一炮瞄准了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从这方面说,家庭这社群和普通的社群不完全一样。”他接着说:“但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明说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可以依靠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家庭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庭也可以等于家庭^③。”他又在《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中说:“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确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的一圈而已^④。”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与国家(即古人的天下)的逻辑关系,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更有一种由家推广至国家的教育理念,《大学》“三纲八目”明确写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② 周作人:《礼教吃人》,止庵校订《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7-38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9页。



所以,传统社会中,家的特征——包括其不合理部分——可推及国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某些痼疾在家这个小团体中业已存在并在个体人成长中不断发挥作用,家承担了培养传统社会理想人才的最初功能。事实上,这种熏陶教育对个体人格的塑造比个体进入社会后所能习得的内容更庞杂、更有渗透性、更具潜移默化功能,同时,由于这种教育大多基于父母—子女这层关系,一方面,个体被压制度比学校或社会更严厉,传统社会中有一套肃整的父子关系“规章守则”,父母有绝对权威;另一方面,父母和子女共同生活,可以起到更好的监督规范作用。“五四”作为一场文化运动而非军事斗争,鲁迅及“五四”一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将批判反思的矛头直接对准家族这个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追本寻源,而后正本清源,将传统社会一切腐朽及不合理现象从根本上给予批判反思,因此,暴露传统家族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传统的弊害,成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从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5期开辟《女子问题》专栏开始,对妇女职业问题、教育问题、社交问题、婚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层面的权利义务问题等开展了广泛讨论。揭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对青年一代肉体及精神残害,是当时作家十分热衷的主题之一。

《狂人日记》后,鲁迅的最重要作品都沿袭了这一主题。

2

《狂人日记》开始于月光,月光在作品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出于烘托环境的审美需要,一方面,狂人的情绪随月光(有月光或无月光)而变化;另一方面,在狂人下意识中,月光似乎有一种启迪的力量,从无穷远处、从一个不能确定的地方投到眼前,穿越三十多年黑沉沉的生活,在他心头突然展开一片全新天地。

作品正文第一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他在这独特的月光中醒过来,这醒不是普通睡眠意义上的醒,而是一种对过去三十多年生活、甚至对自己所沉浸的文化本质的理性清醒,清醒过来的他有着高度警觉,“然而须十分小心”。果然,第二节,“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果然,他看见了一个个不祥的场景:赵贵翁的怪眼色,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那个最凶的人张大的嘴,孩子



们和赵贵翁一样铁青的眼色……很显然,他和这个生活过三十多年的环境发生了龃龉,他感到了害怕,便从头直冷到脚跟。这害怕——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一个清醒了的先觉者的心里感受,也是一个被多年环境压迫至迫害狂的人的内心体验,既有非理性成分又有理性成分,事实上,更接近于一个理性的人对周围环境的反应。由于这种龃龉、这种反应,他便努力从历史中找寻原因,便有了四千年吃人历史的发现。第三次出现月光,已到了第八节,已经清醒、且明白了“吃人”历史又观看了“吃人”现实表演——现实“吃人”的方法——的他,开始救治仍未醒过来者,他的救治行为自然从年轻人开始,这时,“天气很好,月色也很亮了。”然而,救治并不成功,一切复又回到原来状态,从此,月光便再没出现。

月光的意象,很容易使人想起但丁《神曲》中的贝亚特丽丝。柯尔提乌斯认为她是上帝的发散。查瑞提则坚信,她是基督的一个形象,但又不是基督或教会本身,“她没有代替基督,她只是反映或传达了基督的旨意。”斯皮泽认为:

贝亚特丽丝是一则寓言,它不仅是启示的寓言而且是个人启示的寓言,她的自传性来源和她的彼岸性地位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她不是天使,却是人的有福灵魂,正像她影响了俗世的但丁一样,她也被唤来为但丁的朝圣服务,这一任务她一人即可担当;她不是圣徒,只是贝亚特丽丝;她不是殉道者,而是早逝者;她留在世间只是为了让但丁看到奇迹的可能性^①。

在狂人这个觉醒者的感觉里,月光又有希望的意味,在黑沉沉的漫漫长夜里,只要月光出现,他的勇气会恢复,不管从历史中找寻原因的勇气,还是对周围那些仍未清醒者救治的勇气,相反,只要月光消失,他会被另一种状态控制。

狂人不是基督徒,对月光,不可能有但丁对贝亚特丽丝那种宗教体验,但他有理性,这从正文文本中看得明白:第一节有月光,他醒过来,但他害怕,“我怕得有理。”第二节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看见周围那些人的脸色和表情后,他自然要找寻这些异常脸色和表情背后的原因,赵贵翁等对他的仇恨和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有关,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指代什么不言而喻,那是一帮人,“但是小

^① 斯皮泽:《代表文集》,转引自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75-76页。



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叫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原因，“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第三节，“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自然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是，作品中，狂人并未依循逻辑或纯粹理性方式推寻，而是展开无尽的想象，“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最后，他翻开历史：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那部分最精粹、最深刻的文学表述。这一发现的意义，刘再复认为：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创造了一个有高度象征性的艺术境界，暗示中国社会是食人者“吃人”的昏暗世界。……小家族里的众生要从肉体上吃人，其实折射着传统中国大社会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扼杀与吞灭。就像那个小家族要吃掉与他们不一样的狂人那样，大社会也无时不在尽力扑杀个人的人格尊严与主体性：剪灭异端而同归于“一”，除掉“大不敬”而同归于顺，凡是发狂者都在被食之列。鲁迅后来说他写《狂人日记》的意图是暴露中国家族制度的罪恶，这是很贴切的解释。中华帝国的支柱就是宗法家族制度，鲁迅用简洁的“吃人”两字，就把它本质形容出来。家族制度及其惰性的长期存在，构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形态过渡的巨大障碍，鲁迅第一个用小说的形式对中国人生作出这样的评论，向知识界和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这表明他对中



国社会有着极其深刻的观察^①。

夏志清在评价《狂人日记》时说：“鲁迅对于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其严肃的道德意义甚明，表现得极为熟练，这可能得力于作者的博学，更甚于他的讽刺技巧^②。”崇高的道德感从一个被迫害至发狂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种极高的讽刺，这讽刺不是让人去笑，而是让人沉默、思考。“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这是狂人的感受，其实，也是文本传达给读者的感受，于此可感受到鲁迅的悲愤。

这一发现当然震古铄今，但是，如果像大多数评论者认为的那样，《狂人日记》的最大贡献——或其最核心主题——是发现了四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吃人”本质，这样的认识，使作品至少一半——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被忽略。

先看看上面所引发现“吃人”真相那段话，首先，没有年代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为什么这历史没有年代？对历史而言，年代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倘若真有没有年代，这历史还是真实的历史吗？回答当然是，肯定是历史，是文学的对历史的戏谑表达方式，这技巧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就用过，空空道人和石头的一段对话：“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入，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③很显然，鲁迅的不用朝代和曹雪芹的不用朝代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曹雪芹用这技巧也许反话正说，以不着朝代来确指某一固定朝代，鲁迅的不着朝代，显然不指某一具体——即便是隐晦所指——朝代，而是指所有朝代，这样，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整个传统社会。其次，满篇的“仁义道德”和字缝里满本的“吃人”，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的一幅讽刺图景，如果能将这一图景理解为一个意象，那么，这意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画岂止入木三分，简直可以用敲骨剔髓形容。

这是狂人的发现，当然是鲁迅的发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从整个文

① 刘再复：《鲁迅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307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③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本看,发现“吃人历史”在第三节即告完成,《狂人日记》正文共十三节,可以说,文本在一个结构非常精确的地方完成这一发现,此后十节,转向另一发现——也可称为揭示,即从对历史“吃人”的发现转向对现实“吃人”的发现或揭示。作品展示出两个共时存在的“吃人”事实:“吃人的历史”和“吃人的现实”,前者为纵向,贯穿于四千年传统历史,后者为横向,隐匿于现实社会横截面的每一个微小单元;前者是后者的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前者流动在后者中,后者反过来强化前者进而强化自身,二者形成奇异的同构关系。

3

作品中,狂人以独立个体形象出现,鲁迅称这种人为“独异”者,他由昏睡者变为清醒者后,立即陷入一片怪异的场域中,这场域由他曾侧身其间的“他们”组成,随之,他和他们间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此时,他属已觉醒个体,觉醒前,仍属旧有群体,并不以独立身份存在,因此不存在个体与群的对立,可一旦觉醒,那种表面上的“和谐”关系即被打破,他从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群体中游离出来,成为群体的异类。文本中,“他们”是个带有群的特征的集合体,曾多次出现:

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

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

他们是会吃死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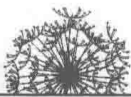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

他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他们岂但不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

……



文本中,该群体构成与狂人相对的一极,这一群体的组成极其复杂,而且无处不在,事实上,“他们”组成了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其实,“他们”既非天生精于此道者,也非以此为职业者,“他们”并非高居人上者更非施威他人者,“他们”同样受过肉体的折磨及灵魂的煎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就是这些曾经的受害者,竟联起手来,将已觉醒的狂人围得铁桶相似,尽管狂人清楚他们间绝非靠某共同理想结为一体,各成员之间,“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同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但是,这种涣散的,既无明确目的又没有共同理想的奇诡结合最终凝固为一种极难毁坏的攻守同盟,如赵贵翁、路人、小孩子、打儿子的女人、大哥、老头子及陈老五,等等,共同对付他这个奇异个体。

围绕他的现实世界仍死水一滩,毫无变化,只是他变了,因他的变化,立即引起现实世界对他态度的变化。他从这个世界中分离出来,不再以为他正常,同样,这个世界也不再以他为正常。狂人的常态和现实世界的常态产生了裂变,这片本来风平浪静的世界因之也裂变成两个对立的、一方必致另一方于绝境的世界。一方是狂人,独异个人,另一方是群,双方都欲让对方回到各自的常态。然而,对“他们”而言,常态世界自然还是四千年延续下来的那个空间,但对狂人,常态世界却是一个全新天地。

同时,在狂人的幻想中,除前述出现于周围的真实的他们,周围始终还围着一伙面貌不甚清楚的人,“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却是探头探脑的挨过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迫害狂眼中的幻景,道出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与前面出现的“他们”相比,这后一种“他们”更具恐怖感,毁坏力也更强,甚至梦中都无法逃脱。如此,一实一虚两个层面的“力”相互缠结,形成一个立体网罗,“他们”至死不肯跨过那一步,狂人也就至死无法脱逃。

鲁迅在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的《随感录·三十八》谈过个人和合群的关系问题:

中国人向来有些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